

# 从普希金到巴赫金

——俄罗斯文论和文学研究

程正民◎著

闽籍学者文丛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从普希金到巴赫金

——俄罗斯文论和文学研究

程正民◎著

闽籍学者文丛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普希金到巴赫金：俄罗斯文论和文学研究/程正民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9

(闽籍学者文丛/张炯，吴子林主编)

ISBN 978-7-211-07141-8

I. ①从… II. ①程… III.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评论

—文集 IV. ①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1407 号

## 从普希金到巴赫金

CONG PUXIJIN DAO BAHEJIN

——俄罗斯文论和文学研究

作 者：程正民

责任编辑：陈斯敏

特约编辑：张 宁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mailto: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桔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7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141-8

定 价：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总序

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又略显局促、逼仄。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冲出“边缘”进入“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中心”相疏离的“外省”特色，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候”：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渐次南移，尤以唐宋为甚，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福州、厦门被列入“五口”开放，西学进入沿海城市，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如，“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等等。此后，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风云际会，主动发起、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意义重大的论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尖兵”。为此，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京派”“海派”“闽

派”三足鼎立之说。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既是一项殊荣，也是一种鼓舞。

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取是之故，我们不拘于一“派”之囿，以“闽籍学者”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

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们欣然编选、推出这套“闽籍学者文丛”，其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为学术发展尽一绵薄之力。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闽籍学者阵容强大，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闽籍学者文丛”具有开放结构，第一辑推出的为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既有年逾八旬的老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闽籍学者文丛”还将推出第二辑，并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张 炯 吴子林

2015. 1. 6

## 序

---

1955年，我从厦门双十中学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我的祖籍是惠安，出生地是厦门，18岁以前一直在厦门生活和求学，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是家乡的老师培育了我，我对福建、对厦门怀有深深的感情。60年来，我并没有对家乡做出什么特别的贡献，家乡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女。这些年我也出版过一些专著和自选集，但得知家乡要为我们出版“闽籍学者文丛”，内心还是感到非常温暖。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1983年我的第一本书（翻译苏联学者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0年后家乡为我出版自选集还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看来，我的学术生涯同家乡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1959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道路。60年代中期，转入苏联文学研究室和后来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俄苏文论和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90年代初，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叶落归根，我又回到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退休以后，我一直在2000年成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60年来工作单位虽有变化，但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理论，重点也一直是俄苏文学理论。

“文化大革命”前我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大批判”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们一代人的宝贵青春是在政治运动中耗掉的。好在历史是有情的，新的历史时期使我们重新获得学术生命，在科学的春天里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我的研究工

作以俄苏文论为中心，先后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 俄苏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2.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的研究；3. 巴赫金的研究；4. 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眼前这个论文集不可能全面反映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两个主题：一是在介绍20世纪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同时，重点展现以往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的、然而具有国际影响的其他诗学流派，思考20世纪俄苏文论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反映我如何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俄苏作家创作的研究，思考如何开拓俄罗斯文学研究新的理论空间。文集名曰《从普希金到巴赫金》，指的是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到20世纪，也指的是研究内容——既包括文论研究也包括文学研究。

## 二

新时期我的学术研究是从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从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研究起步的。俄苏文学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过独特的、深刻的影响，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1983年，我参加刘宁主持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俄苏批评史》的研究工作，同他一起给研究生开设“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共同编写出版《俄苏文学批评史》（1992），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俄苏文学批评史》（1999）的编写。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抓住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重点人物进行研究，这两个项目先后被列入“八五”和“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1997）和《卢那察尔斯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2006）这两本专著。尽管当下有些人看不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但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当今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都十分看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无法绕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随着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为了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新形态以及出现的多样性、当代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征，我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并邀请我的朋友童庆炳同我一起担任总主编，大家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七大卷的《20世

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2012)。其中,我参加了《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编写,《20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文论的发展》一章作为全书的总序,反映了我对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的看法。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论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随着材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俄罗斯文论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不仅有普列汉诺夫、列宁、沃罗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光辉的名字,也有什克洛夫斯基、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和巴赫金这些曾受过批判但具有国际影响的文论大家,不同的诗学流派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诗学多姿多彩的灿烂图景,他们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开拓了新的文艺理论空间,影响了世界文论的发展。注意到这种新情况,近十几年来,我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以巴赫金的研究为起点,开始转向更为开阔的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并于2010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同我的年轻朋友一起从事社会学诗学、形式诗学、心理诗学、叙事诗学、历史诗学、结构诗学和文化诗学等七大诗学流派的研究。

20世纪初,俄罗斯诗学产生了重要变化,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的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等同政治、经济的庸俗社会学(非诗学的社会学),出现了只讲形式结构忽视历史文化语境的形式主义(非社会学的诗学)。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把文学的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统一起来,成了文艺理论家纠结的大问题。当年俄罗斯各诗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顶住了被打成“形式主义”的罪名和被批为“离经叛道”的种种压力,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理论探索。普罗普用了20年时间以故事结构研究为起点,进而把故事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叙事学。维戈茨基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专注于作品叙事的结构研究,寻找读者审美反应和文本艺术结构的内在联系。洛特曼的诗歌研究从诗歌结构入手,研究诗歌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关系,提出应当把文本结构和超文本结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这些诗学流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结构的研究,又努力继承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结构和历史的融合、内部和外部的贯通,为文学研究闯出了新路。

在20世纪俄罗斯各种诗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我神往的是巴赫



金的诗学。巴赫金是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80—90年代，当他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他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在此之外，我更关心他的诗学理论。我认为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谈的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诗学，巴赫金是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来表达和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深刻，而且独具特色，其中包括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和社会学诗学等等。当年我的巴赫金诗学研究是从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起步的，是在我的老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上谈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和中国狂欢文化的关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他看到我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的论文《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时，鼓励我将它扩展为一本书。2002年1月，我把刚出版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送到病床前时，他露出了微笑，而由他审阅过的《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发表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时，他已离我们而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书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复调小说研究中，既细致地分析了复调小说在体裁、情节、结构和语言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又深入揭示了复调小说的文化历史根源，它同民间狂欢文化的联系，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这样，他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完全融为一体。在从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之后，我又先后研究了巴赫金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和社会学诗学，在这些研究中，我感到巴赫金不仅对各种诗学的研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理论建树，其中诸如“超语言学”“体裁社会学”“小说性”“文学的内在社会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都有很强的理论独创性和很高的理论价值。同时，巴赫金又把诗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复杂而多面的现象，有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形式多种层面。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而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研究又不是互不相干的，它们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最富独创性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因此，我把巴赫金的诗学命名为巴赫金的整体诗学。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

局：1. 把形式和体裁放在一个重要的突出的地位，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形式和体裁切入，从形式和体裁的创新来把握思想内容的创新，来把握作家创作真正特质。2. 把文化诗学作为诗学研究的中心，既反对把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又反对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性，把文学同社会历史文化割裂开来，主张在一个时代广阔的整体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和把握文学现象。3. 为了深入把握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体裁的特征，还必须把体裁诗学同历史诗学结合起来，对艺术形式、艺术体裁、艺术手法的演变过程作深入的历史分析，使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得到相互印证。

不管是巴赫金也好，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也好，他们的研究对象虽然各不相同，巴赫金是研究小说的，普罗普是研究故事的，洛特曼是研究诗歌的，但他们都在克服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和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实践文学研究中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既弘扬了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并克服其对艺术结构形式的忽视，又吸收西方文论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并纠正其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世界文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 三

选集第一部分侧重于俄罗斯文论，第二部分则侧重于俄罗斯文学，除了两篇涉及苏联文学，大部分是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有别于一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我是着重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作家，采用这种研究角度又是同我80—9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很大关系。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活跃起来，许多研究文学理论同行从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转向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而言之，它是同关注人自身、研究人自身的思潮相联系的，是同文艺界对审美主体的重视，对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探求相联系的。文艺心理学在洞悉艺术的奥秘方面，比起文艺学的其他分支来就有不可代替的优势。从我个人来说，由文艺社会学转向文艺心理学研究，则是同自己的学术旨趣相关。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中，我一直对作家的个性和作家创作过程的奥秘感兴趣，但又苦于无法从理论上透彻说

明一些问题，传统的文学理论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而文艺心理学恰好能为探讨这些问题找到一些出路。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最早得到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他热情鼓励我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并建议我利用熟悉俄苏文学文论的优势，先从了解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做起。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翻译了苏联心理学家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苏联文艺学家梅拉赫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1985第6期）一文。事物的发展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1985年我的朋友童庆炳恰好申请到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他诚恳地邀请我参加这项研究，于是我们同他的十三个硕士生组成一个充满学术锐气、团结和谐的学术集体，师生平等地展开研究和对话，共同在文艺心理学的世界里遨游，当年的情景至今仍然令人神往。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现代心理美学》（1993），其中我写了“总论”。作为这项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出版了一套《心理美学丛书》（十五种），其中我写了《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1990）。

《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次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试图从作家个性特征和艺术思维特征的角度，更深入地揭示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奥秘和底蕴，为俄罗斯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新的天地。研究的中心是作家的个性心理，其特色是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我力求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阐明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心理，同时又借助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的丰富内容来思考和深化文艺心理学一些重要的理论内容，其中涉及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气质的关系，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思维类型的关系，以及作家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等问题。例如在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关系问题上，指出由于感性、理性等不同的思维组成因素在不同作家身上形成不同的独特联系，作家艺术思维可以划分为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等不同特征，造成了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普希金的创作个性是同诗人富于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和不断变化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是同思想、感情和形象和谐统一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则是同作家充满矛盾和充满活力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陀氏艺术思维中的感情因素和理性因素、形象因素和思想因素，常常处于不平衡、矛盾的状态。当作家

从现实生活出发，当他的艺术思维中情感的因素占优势，逻辑的理性的因素被掩盖时，作品就充满艺术力量；当他的艺术思维脱离现实生活，逻辑的理性的因素占优势，具体的形象的感性的因素只能做一种点缀时，作品必然丧失艺术力量。但总的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维体系是现实的，它比其他作家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偏执理论更有力量，天才作家不朽的力量概源于此。

随着研究的深入，渐渐发现文艺心理学研究也有局限性，作家的创作心理实际上不仅是一种个性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把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必然的，于是便有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俄国文学主人公的演变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俄苏文学创作和世纪之交的俄国心理学》等文章，并收入多人合作的《文学艺术创作与社会心理学》（1997）之中。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中，我在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论文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讨托尔斯泰创作的矛盾、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独创性、托尔斯泰艺术思维的变化和托尔斯泰美学思想同俄国农民心理的内在联系，指出托尔斯泰把俄国千百万农民的真诚和天真、抗议和绝望，完全融进自己的创作探索和美学探求之中。

回顾六十年所走过的研究和教学的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一直在文学理论研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两界穿行，我的文论研究以俄苏文论研究为中心，同时又同俄苏文学创作密切联系。文学理论研究的视角使得我的俄苏文学研究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而俄苏文学研究又使得我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创作实践的依据，心里也感到更踏实一些。但这种两界的穿行由于自身学养的不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两方面的研究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并留下了不少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一切很难再有大的变化。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学术道路上我始终没有懈怠，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有师长、同行和朋友的陪伴和帮助，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 目 录

序 .....	( 1 )
<b>第一辑 俄罗斯文论研究</b> .....	( 1 )
20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	( 3 )
俄罗斯艺术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创新 .....	( 22 )
历史地看待俄国形式主义 .....	( 33 )
普罗普的故事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 .....	( 48 )
维戈茨基论艺术结构和审美反应 .....	( 64 )
洛特曼论文本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 .....	( 73 )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	( 88 )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	( 103 )
巴赫金的体裁诗学 .....	( 116 )
巴赫金整体诗学研究和当代文艺学建设 .....	( 130 )
<b>第二辑 俄罗斯文学透视</b> .....	( 141 )
普希金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思维的特征 .....	( 143 )
历史的张力和艺术的魅力 ——普希金历史题材创作艺术经验二题 .....	( 160 )
果戈理：气质、生命力和创作 .....	( 171 )
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艺术 .....	( 187 )
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 .....	( 214 )
苏联当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革新 .....	( 235 )
苏联文学优秀经典的张力和魅力 .....	( 247 )
学术简表 .....	( 253 )

第一辑 俄罗斯文论研究



## 20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艺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崛起，是 20 世纪世界文论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俄罗斯文论的整体面貌，对 20 世纪世界文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出现，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揭开了新的篇章。这时，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不仅仅是俄罗斯文论中的一个理论流派，而是成了俄罗斯文论的主潮，成了苏联文艺界的指导思想。这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论区别于西文文论最重要的特点，20 世纪苏联文学和文论发展与此息息相关，离开这个基本特点，不承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很难对 20 世纪俄罗斯文论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述。当然，20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也经历了挫折和失误。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它始终植根于俄国文化和文论的优良传统，它始终同内部和外部的文论流派展开紧张的对话，并且在这个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

### 一、20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脉络

根据 20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它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20 世纪 20—30 年代；20 世纪 50—60 年代；20 世纪 70—80 年代。四个时期从总体上讲有共同的特点，而每个时期又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个时期：崛起（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的时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和斗争的时期，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这是俄国历史的转折期。这个时期俄国文坛的文学理论



批评也同样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当时存在民粹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现代主义文学文论和批评，经院派文学理论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当时并不是唯一的理论批评流派，但在多种理论批评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日益扩大其影响，它的崛起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重大现象。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俄国崛起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它是同俄国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密切相连的。这个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普列汉诺夫阶段和列宁阶段，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开拓者，列宁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首先他们独立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文学理论批评，解决理论批评的实践问题。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们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信件，都没有公之于世，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没有看到。恩格斯在1859年给拉萨尔的信中，1888年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提到了现实主义问题，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普列汉诺夫在1888年评论民粹派作家乌斯宾斯基的论文中，列宁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论文中，也都涉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他们在许多观点上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他们之间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关系。前者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关于文学倾向性和社会作用的观点，关于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见解，都给后者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其次，他们是在批判民粹派和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的斗争中，在批判自己队伍内部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是从批判民粹派开始发展的，普列汉诺夫本人来自民粹派，反过来又批判民粹派，并在批判中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

第三，他们是在总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他们非常关心和重视高尔基的创作和其他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并在总结他们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时期：确立（20世纪20—30年代）。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俄罗斯文论中确立主导地位的时期，